

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机理探析 ——基于广东省佛山市的调查

胡诺琪, 王成超, 徐丹*

(佛山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广东 佛山 528000)

摘要: 在乡-城人口迁移转向家庭迁移背景下, 流动儿童相对贫困问题是当前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瓶颈之一。随着大量流动人口涌入佛山, 处于发育关键期的流动儿童进入新城市会面临身心融入挑战。基于广东省佛山市流动儿童 232 份问卷调查数据, 选择营养、健康、生活水平、教育、住房、家庭陪护 6 个维度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采用 A-F 法探究多维贫困特征, 再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发现影响因素, 揭示流动儿童致贫机理框架和致贫因子。研究表明: (1) 当 $k=0.33$ 时, 流动儿童贫困发生率高达 80%; (2) 营养、生活水平、家庭陪护等维度贫困贡献率突出; (3) 社交状态、父亲职业、养育的子女数量、老家所在地是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主要致贫因子。测度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状况, 有利于更好地满足流动儿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共同富裕的实现。

关键词: 流动儿童; 多维贫困; 贫困测度; 影响因素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红壤生态脆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演化过程与机理”(42171284);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2YJCZH199); 广东省社科项目(GD23CGL02); 2025 年佛山大学学术基金项目(xsjj202508zsb02); (xsjj202508zsc04)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286

一、研究背景

自 2020 年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 我国的扶贫工作重点转为解决我国妇女、儿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问题。据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 2021—2022》, 全国流动儿童规模达 7109 万人, 占儿童总数的 23.9%^[1], 随着大量儿童流入父母打工的城市, 城市社会制度保障体系不全面、家庭贫困代际传递与外地人群融入难等问题愈发显著, 体现出流动儿童多维贫困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及研究的重要性。贫困始终是困扰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传统理论认为贫困主要由收入引起, 是个人或家庭无法获得基本的生活需求从而导致贫困状态^[2]。但贫困是一种社会相对现象, 其定义随社会日益发展而不断进化^[3]。伴随目前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 各研究组织给出的儿童贫困定义繁多, 但其共识是将儿童贫困概念拓展到了多维^[4], 贫困结果不止涵盖收入因子, 同时有教育、心理等因子。基于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的多维贫困理论, 采用以能力定义贫困的方法, 其测量角度超越传统单一的收入维度, 从多个维度评估个人的贫困状态^[5-7]。多维贫困理论的发展使贫困研究能更全面考虑社会结构性因素, 为解决贫困问题提供更有效的路径。

在贫困内涵拓展、有效测量方法增加的背景下, 儿童多维贫困的研究数量日趋增多。目前研究主要聚焦识别多维贫困^[8-10]、影响因素分析^[11-13]两方面展开。前者多采用 A-F 方法^[6], 因不同学者使用的研究数据与研究主题不同, 儿童多维贫困维度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生活水平、水源、卫生设施等维度上; 后者多由早期关注年龄、户口等个人特征逐渐拓展至地理因素与区域特征等外部环境。然而, 现有研究对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贫困研究并不充分^[12, 14], 较少考虑流动儿童的营养吸收、家庭的耐用消费品拥有率、居住与活动空间以及融入新社会时所需的家长陪护等维度; 且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机制尚未明晰, 尤其缺少探究致贫机理。鉴于此, 测度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水平与影响机理探析, 既有利于探究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身心需求, 也能更好满足流动儿童对

作者简介: 胡诺琪 (2004—), 女,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

王成超 (1979—),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通讯作者: 徐丹 (1982—), 女,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与 GIS 应用。

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实现。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的出台,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区域双重隔离主要体现在大中城市。本文采纳吕利丹等人对流动儿童概念的界定,流动儿童是指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且流动到户籍登记地所在区县以外的人^[15]。以往的流动儿童贫困研究虽然成果丰富,但存在较多不足,针对当前研究局限性,本文以广东省佛山市城镇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选取营养、健康、生活水平、教育、住房、家庭陪护6个维度共10项指标综合测度该市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状况,再基于个人、家庭和区域特征提出影响机理研究框架,最后使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究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致贫因子。

二、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Alkire 和 Foster 所创立的“双界限法”测度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根据此思路,先计算多维贫困发生率再计算平均剥夺份额,得到多维贫困指数为:

$$MPI (PI=H(k) \times A(k)) = \frac{q}{n} \times \frac{\sum_{i=1}^N c_{ij}(k)}{q} \quad (1)$$

其中, MPI 为佛山市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 H 为佛山市流动儿童多维贫困发生率, A 为平均剥夺份额, q 为佛山市流动儿童多维贫困人口, n 为调查样本总人口,体现了贫困广度; $c_{ij}(k)$ 表示为个体 i 在不同维度 k 下被剥夺的指标数量,体现了贫困深度。

当因变量是二分类时,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能够科学判断其影响因素。本研究被解释变量为流动儿童的多维贫困状态,如果流动儿童在值下处于贫困,则记为 1,反之则记为 0,建立二元 Logistic 模型如下:

$$\log itP = \ln\left(\frac{P}{1-P}\right) = a_0 + \sum_{i=1}^k a_i x_i \quad (2)$$

P 为流动儿童陷入多维贫困概率, a_0 为截距项, a_i 各自变量在模型中的回归系数。

(二) 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构建

在实际调查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择取营养、健康、生活水平、教育、住房、家庭陪护6个维度,其中选取 BMI 即身体质量指数^[11,16]、医疗保险^[17]、生病频率^[18]、人均生活支出^[19]、耐用消费品^[12]、到校时间^[20]、独立书房、独立卧室^[21,22]、父母看护^[13]、亲子活动频率^[22]共10项指标,其中每个维度的权重相等。基于此,最终构建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广东省佛山市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及权重

维度	指标	指标的剥夺临界	权重
营养	BMI	低于或高于标准值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6
健康	医疗保险	没有商业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生病频率	儿童三个月内生病两次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生活水平	人均生活支出	小于等于佛山市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平均值 (每个月 3677 元) 赋值为 1, 赋值为 0	1/12
	耐用消费品	家庭没有任何一个以下耐用品: 摩托车或电动车、电脑、空调、冰箱、洗衣机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教育	到校时间	上学路途时长超过 15 分钟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6
住房	独立书房	家中没有独立书房供孩子学习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独立卧室	家中没有独立卧室供孩子休息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家庭陪护	父母看护	长期没有父母 (或一方) 陪伴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亲子活动	两周以上家长没有与孩子娱乐、游戏等活动赋值为 1, 否则为 0	1/12

三、调研点概况及数据来源

佛山市地处广东省中南部,处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地段。第二产业是佛山经济的中流砥柱,制造业更是其经济的核心根基,机械装备、家电家具、陶瓷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势十分明显。伴随佛山经济持续增长与人口不断流入,

流动儿童规模也在稳步扩大。2024年，佛山常住人口一共是961.54万人，其中有452.47万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占47.1%，流动儿童数量约60万。佛山市制造业发展壮大，工人需求量多，因此吸引了大批携带家庭的外来打工一族与农民子弟，因此佛山流动儿童群体逐渐庞大。

本研究采集数据的方法为问卷调查和访谈法。数据的获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进行正式调查之前，2023年12月进行了预调查，团队从佛山市随机选取2个镇，每个镇抽取5-10名流动儿童进行预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第二阶段：2024年1月开始正式调研，采用分层抽样，选取4个镇，各镇依据区域位置和流动儿童学费区间划分为城镇中心与城郊地区两类空间，以及3000-4000元、4000-5000元、5000-6000元和6000元以上四个学费层次，选取流动儿童较为集中的学校进行实地问卷派发。调研地点分布在祖庙街道、石湾街道、南庄镇与张槎街道。每次调研持续2到3小时，每位儿童的调研平均时长为15至20分钟。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38份，筛选后获得有效问卷232份，有效问卷率为97%。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 多维贫困特征

佛山市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水平高。如表2所示，随着贫困临界值 k 值的增大， H 值和 MPI 不断减小，而 A 值不断上升，说明处于严重多维贫困状态的流动儿童人数逐渐减少，但他们的贫困程度和维度剥夺状态不断加深。当 k 从0.2增加到0.6时，贫困发生率 H 值从92.3%下降为21.97%，表明该区域流动儿童多集中在 $k=0.2-0.6$ 之间受到剥夺。学术界常用 $k=0.33$ 时作为测度多维贫困的剥夺临界值，当 $k=0.33$ 时佛山市城镇流动儿童的多维贫困发生率 H 值为79.55%，平均剥夺份额 A 值为52.22%，多维贫困指数 MPI 为0.415，这表明佛山市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状况严重。

(二) 指标和维度贡献率

当 $k=0.33$ 时，BMI、生活水平、到校时间位居前三，分别为14.84%、13.43%、10.8%，这些指标是流动儿童多维贫困治理中的重点。如表3所示，在不同 k 值下，将多维贫困指数分别按10个指标和6个维度分解。指标贡献率呈现三种趋势，第一种是维持高贡献率，如BMI，表明其是流动儿童普遍被剥夺的指标；第二种是随 k 值增加而贡献率上升，包括到校时间、独立卧室、父母看护，表明这些是深度贫困的个体主要被剥夺的指标；第三是贡献率下降，如生活水平，表明对深度贫困的流动儿童来说，遭受多方面贫困剥夺。在5个维度中，营养、生活水平、家庭陪护维度贡献率较高，反映佛山市家庭生活水平普遍较低，流动儿童身体营养少，父母职业收入少、工作时间较长导致陪护流动儿童时间短。

表2 多维贫困测度结果

贫困临界值 (k)	贫困发生率 H(k)	平均掠夺份额 A(k)	多维贫困指数 MPI(k)	人数
0.1	96.97%	46.94%	0.455	128
0.2	92.42%	48.43%	0.448	122
0.3	79.55%	52.22%	0.415	105
0.33	79.55%	52.22%	0.415	105
0.4	62.88%	57.23%	0.360	83
0.5	49.24%	61.54%	0.303	65
0.6	21.97%	71.55%	0.157	29
0.7	8.33%	79.55%	0.066	11

表3 不同k值下维度和指标贫困贡献率

k	营养 (BMI)	健康	医疗保险	生病频率	生活	耐用消费品	到校时间	住房	独立书房	独立卧室	家庭陪护	看护情况	亲子活动
0.1	16.1%	14.1%	8.5%	5.7%	26.5%	11.9%	12.2%	15.1%	8.6%	6.5%	16.0%	6.7%	9.3%
0.2	16.4%	14.0%	8.2%	5.8%	25.8%	11.7%	12.4%	15.4%	8.7%	6.6%	16.1%	6.8%	9.3%
0.3	16.1%	14.6%	8.5%	6.1%	24.8%	11.4%	12.5%	15.5%	8.7%	6.8%	16.6%	7.0%	9.6%
0.33	16.1%	14.6%	8.5%	6.1%	24.8%	11.4%	12.5%	15.5%	8.7%	6.8%	16.6%	7.0%	9.6%
0.4	16.8%	13.7%	7.9%	5.8%	23.5%	11.2%	14.4%	15.6%	8.8%	6.8%	16.0%	7.0%	8.9%
0.5	16.3%	13.3%	7.9%	5.4%	22.7%	11.3%	15.4%	15.8%	8.8%	7.1%	16.5%	7.5%	9.0%
0.6	16.9%	12.0%	7.6%	4.4%	21.3%	10.8%	17.7%	14.9%	7.6%	7.2%	17.3%	8.0%	9.2%
0.7	17.1%	11.4%	7.6%	3.8%	19.0%	10.5%	21.0%	16.2%	8.6%	7.6%	15.2%	7.6%	7.6%

(三) 流动儿童多维贫困影响因素与机理框架

将 $k=0.33$ 时作为贫困临界值,此时的测度结果具有科学性与广泛性,此时贫困发生率为79.55%。样本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状态作为被解释变量,若城镇流动儿童在 $k=0.33$ 状态下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则记为1,反之则记为0。本研究将影响佛山市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因素划分为三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特征。

回归分析显示,社交状态、父亲职业、养育的子女数量、老家所在地,对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个人特征方面,朋友少于10人的流动儿童比多于10人的流动儿童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高。在监护人特征方面,父亲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的比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的流动儿童的概率高。在家庭特征方面,养育的子女数量越多,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高。从地区方面来看,老家位于我国中部与西部比东部的流动儿童陷入多维贫困概率高。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

表4 城镇流动儿童多维贫困发生影响因素模型结果

		B	显著性	EXP(B)
	性别(参照组=男性)			
	女性	0.499	0.488	1.647
	年龄	0.076	0.792	1.079
个人特征	健康自评(参照组=更健康)			
	更差	0.194	0.805	1.214
	社交数量(参照组=朋友数量多于10个)			
	朋友数量少于10个	1.312	0.096*	3.714
	全家规模	0.043	0.85	1.044
	赡养的老人数量	-0.374	0.441	0.688
	养育的子女数量	0.862	0.074*	2.369
家庭特征	家庭年收入	-0.038	0.659	0.963
	父亲职业(参照组=以脑力劳动主导)			
	体力劳动主导	1.991	0.065*	7.32
	母亲职业(参照组=以脑力劳动主导)			
	以体力劳动主导	0.973	0.322	2.647
	就读学校学费区间(参照组=3000-4000元)		0.112	
	4000-5000元	-1.32	0.273	0.267
	5000-6000元	-2.406	0.083*	0.09
	6000元以上	2.491	0.061*	12.075
区域特征	就读学校地区(参照组=城镇中心)			
	城郊地区	1.784	0.146	5.953
	老家所在地区(参照组=东部)		0.071*	
	中部	2.191	0.053*	8.948
	西部	1.475	0.074*	4.373
	常量	-4.72	0.231	0.009

注:括号内为对照组, * $p < 0.1$, ** $p < 0.05$, *** $p < 0.01$

结合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搭建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致贫机理框架(图1)。综合显著因子可得:(1)家庭因素是影响流动儿童多维贫困的关键因子,并与区域因子交互影响,解决流动儿童贫困的根源需要从监护人的教育与经济水平入手。家庭与流动儿童的生活紧密相连,贫困流动儿童家庭的流出地多集中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较于东部地区明显滞后;监护人普遍学历较低,流入新城市后,因工作技能不足及新社会制度与生活的排斥,家庭收入偏低,难以享受流入城市居民的同等福利,导致流动儿童教育资源匮乏;此外,贫困家庭多数为农村户口,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家庭内儿童抚养人数较多,使得家庭教育负担沉重。(2)流动儿童个人因素受家庭因素与区域因素双重制约,贫困代际传递、家庭关注少与监护人的学历水平等都会影响流动儿童在融入社会时的身心发展。监护人的工作性质多为高强度、长时间、低收入的职业类型,导致他们较少关注流动儿童的个人与社交情感需求,加之流入地的排斥,使得流动儿童社交融入困难,表现为朋友数量少且交友范围狭窄;再者,家庭生活水平和学校伙食水平低下,直接影响流动儿童的身体素质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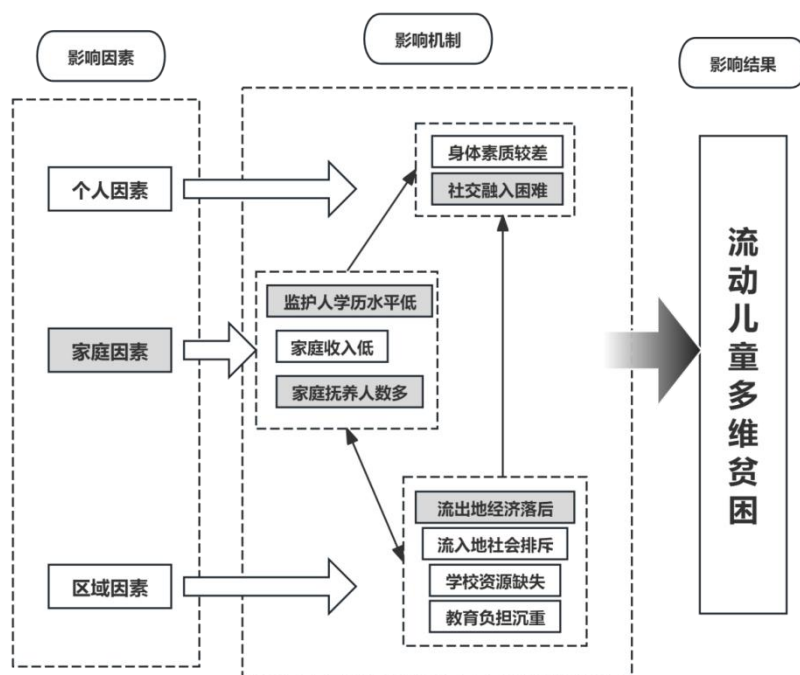


图1 流动儿童多维贫困影响机理

五、结论与讨论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主要有三方面的发现：（1）研究结果显示当 $k=0.33$ 时，流动儿童多维度贫困发生率为 80%，高于前人研究成果 40-70%^[12, 20, 23]，主要原因在于指标体系构建的差异，前人注重个体健康、生存、日常保护、家庭资本等方面，而本研究引入流动儿童父母陪护、亲子活动频率、独立书房与独立卧室等因素进行测度。

（2）维度贡献率数据显示，营养、生活水平、家庭陪护维度贡献率较高。营养补给是健康资本存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影响儿童健康贫困^[18]，此时流动儿童处于身体发育与身体免疫系统的关键期，他们对营养必需品补给需求量大，需要及时为他们补充营养。因为父母外出务工，不重视或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主动与孩子沟通交流，同时孩子的烦恼也无法及时向他们诉说，会降低儿童幸福感、自信心和人际交往的意愿，妨碍儿童健全人格的塑造^[24]。

（3）从影响因素来看，社交状态越低频、数量越少会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社会交往是导致儿童多维贫困的重要因素^[17]。一个家庭中孩子数量越少，父母对一个儿童的关注和照顾相对来说就会越多，那么该儿童就越不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状态^[12]。父母从事医生、会计、律师、政府工作人员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类型会比从事建筑装修、商场服务人员与运输司机等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作类型的教育水平更高，父母的学历水平越高，孩子陷入多维贫困的机会越小^[23]。老家所在地位于中部和西部的流动儿童比老家位于东部的流动儿童更容易陷入贫困，原因可能是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基础教育设施落后，工作机会少，老家位于中、西部的贫困流动儿童流入佛山的数量比东部多。综合以上分析来看，除了儿童个人因素如营养、社交状态影响着其多维贫困状态之外，父母教育、父母陪伴、家庭中孩子个数等因素也是流动儿童的多维贫困的重要因子。因此，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家庭，对待敏感脆弱的流动儿童时都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六、政策建议

随着中国开放力度变大，各城市间的流动活力提高，流动儿童对流动地的身心融入挑战难度大，他们难以享受与本地儿童同等的福利，是需要城市特别给予关心和爱护的对象群体，所以引导社会关注流动儿童的多维贫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第一、搭建社会流动儿童多维贫困动态监测与保障体系。根据《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等最新文件，各级政府可以参照国家标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建立流动儿童数据库，制定流动儿童服务基础清单，对流动儿童的实际生活情况进行数字化。并且重点监测营养、陪护等维度的变化，重点标注父亲职业如小商贩、零工从业者、体力劳动从业者等，多子女家庭，老家所在地等高风险标签。根据对当地的实际摸排工作后，实时调配资源至到如工业园、产业园、城郊等周边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

第二、改善流动儿童生活环境,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流动儿童提供公共学习活动区域,在流动人口聚集地周边社区建设爱心之家,配备自习室、心理咨询室,缓解流动家庭居住压力。为流动儿童发放适量食品券,针对性地对儿童生活必需品进行优惠,并联合志愿者定期入户指导膳食搭配,为家长提供知识普及教育,增强流动儿童营养补给。在心理健康发展方面,社区可邀请专家讲授新市民融入指南课程,定期开展亲子交流活动,提升家庭陪护质量,呼吁家长关注儿童融入新社会的情感需求,引导儿童积极乐观地学习与生活。在社交状态方面,学校可开展各种校本课程,结合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流动儿童对居住地地认同感,社区可以爱心之家在可组织各种游戏与活动,增强其对社区的归属感。

第三、脱贫政策因地制宜,缓解流动儿童家庭贫困代际传递。一方面,结合当地的流动儿童流入实际情况,联合相关流出地,共同推动居住证与户籍地政策联动,完善跨区域救助衔接机制,统筹就业、失业补助资金等经费,完善新市民融入的衔接机制,解决因“老家所在地”导致的保障断裂问题,比如流入佛山的流动儿童多为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同时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政府可以寻找产业联动的机会,不仅可以提升经济活力也可以吸引部分流动人员返乡创业就业;流入地政府可建立新市民技能培训基地,提升人力资本,为流动人口提供适应当地需求的培训活动,如建筑、物流、制造与电商直播技术等,促进流动人口稳定就业,提高收入,提升创业质量和层次,提高流动家庭的收入。另一方面,对养育3名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可以根据家庭人数与实际经济情况提供阶梯式现金补贴,推动多子女家庭子女就近入学,减轻家长接送负担;鼓励企业设置弹性岗位、育儿假,打造友好型企业。

参考文献:

- [1] 韩嘉玲. 流动儿童蓝皮书: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1—2022)[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 [2] Chaudry A, Wimer C. Poverty is not just an indicat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poverty, and child well-being[J]. *Academic pediatrics*, 2016, 16(3): S23-S29.
- [3] 刘凯, 王卓祺.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贫困面貌的演变——概念、测量与时空比较[J]. *社会保障研究*, 2023, (02): 95-111.
- [4] Minujin A. Making the case for measuring child poverty[J]. Ortiz I, Daniels LM, Engilbertsdóttir S. *Child Poverty and Inequality: New Perspectives: UNICEF*, 2012: 14-16.
- [5] 徐蓉焯, 褚淑贞. 中国居民多维健康贫困的测度与分解研究[J]. *卫生经济研究*, 2024, 41(04): 43-46+50.
- [6] Sen A. Poverty, inequality and unemployment: Some conceptual issues in measurement[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73: 1457-1464.
- [7] 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8): 476-487.
- [8] 宋扬, 刘建宏. 儿童时期多维贫困的长期影响——基于 CHARLS 生命历程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 33(03): 72-85.
- [9] 李玲, 刘林, 刘一波, 等. 早期儿童多维相对贫困识别及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来自西部偏远山区的证据[J]. *中国电化教育*, 2023, (09): 9-17.
- [10] 李晓明, 杨文健. 儿童多维贫困测度与致贫机理分析——基于 CFPS 数据库[J]. *西北人口*, 2018, 39(01): 95-103.
- [11] 吕文慧, 苏华山, 黄姗姗. 被忽视的潜在贫困者: 农村留守儿童多维贫困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8, 33(11): 90-99.
- [12] 高琴, 王一.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的水平、趋势与模式研究——基于 2013—2018 年 CHIP 数据的证据[J]. *社会保障评论*, 2022, 6(03): 98-123.
- [13] 蔡佩汝, 汪侠, 闫艺涵, 等.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1, 76(10): 2551-2567.
- [14] Meng F, Zhou G, Liu Z, et al.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mong migrant children: Evidence from China[J]. *Cities*, 2024, 150: 105077.
- [15] 吕利丹, 王非. 人口流动与儿童教育: 基本事实与解释[J]. *人口研究*, 2017, 41(06): 45-57.
- [16] 易欢. 多维贫困视角下儿童禀赋差异识别[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31(19): 150-151.
- [17] 海少琪, 汪侠, 史舒悦. 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性别差异: 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J]. *热带地理*, 2023, 43(5): 897-912.
- [18] 黄莹. 相对贫困视角下儿童健康贫困的逻辑机理及策略研究[J]. *黑龙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2021, (16): 21-23.

- [19] 罗蔚翹, 温慧, 黄婉婷, 等. 进城农民工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J]. 台湾农业探索, 2024, (06): 51-58.
- [20] 王卓, 郭真华. 儿童相对贫困的标准建构与多维测度——基于 2021 年四川凉山州的专题调查[J]. 农村经济, 2022, (08): 1-11.
- [21] 刘佳纯, 王子成. 广州市流动人口住房变动趋势及动因分析——基于 Oaxaca-Blinder 与 Fairlie 方法的分解[J]. 调研世界, 2019 (6): 21-26.
- [22] 杨晨晨, 刘云艳. 早期儿童多维贫困测度及致贫机理分析——基于重庆市武陵山区的实证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9, 40(03): 58-66.
- [23] 魏乾伟, 王晓莉, 郝波, 等. 山西和贵州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测量及现状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8, 34(02): 204-209.
- [24] 李玲, 胡小兰, 黄莉. 家庭多维贫困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基于西部五区县的实证研究[J]. 民族教育研究, 2024, 35(02): 85-96.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Areas: An Analysis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Nuoqi Hu, Chengchao Wang, Dan Xu*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 Foshan University, Guangdong, Foshan 528000, China)

Abstract: With rural-urban migration shifting to family migration, relative poverty among migrant children has become a key bottleneck in building a society of common prosperity. As a large number of migrants flow into Foshan, migrant children fac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gration challenges in the new city. Based on 232 questionnaires of migrant children in Foshan, Guangdong,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icator system covering nutrition, health, living standards, education, housing and family companionship. Using the Alkire-Foster (A-F) method to explor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characteristics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o identify influencing factors, we infer a poverty-causing mechanism framework for migrant children to reveal core poverty-inducing factors. Results show: (1) Migrant children's poverty incidence reaches 80% at the deprivation cut-off ($k=0.33$); (2) Nutrition, living standards and family companionship contribute prominently to poverty; (3) Social status, paternal occupation, number of children raised and place of origin are the main poverty-inducing factors. Measuring their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helps meet migrant children'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Migrant Childre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Poverty Measurement; Influence